

人生沉浮录

在劫难逃

柳萌 主编

当代名家手笔 当代名人纪实



四川人民出版社

在劫难逃

柳 萌 主编

上 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7 月

(川)新登字 001 号

特约编辑:李 涛
责任编辑:汪伊举
封面设计:梁 伟
技术设计:古 蓉

·人生沉浮录·(1 上)

在劫难逃

柳 萌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成都市锦文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2.5 字数 314 千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180-7/I·463 印数:1-20000

每套(两册)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坎坷道路 坦荡人生

——记外祖父俞平伯 …… 韦 奈 (1)

俞平伯是中国当代最有权威的《红楼梦》研究专家，然而就是这样的学者却成为政治运动中的罪人。从50年代初对《红楼梦》的“资产阶级研究方向”批判开始到“文革”结束这几十年间，他是怎样度过来的，很少人知道。本文是生活在他身旁的外孙对他的回忆：他的冤屈，他半夜的狂吼，他的人品，他临终前仍不忘《红楼梦》的情况。令作者不能不感叹：“红楼梦啊红楼梦，你把老人家害得好苦！”

毕竟东流去

——追忆我在江西赣州邂逅蒋经国先生的始末 …………… 公 刘(41)

作者在“文革”中硬被当作蒋经国的“干儿子”而受到

批斗。其实他并不是蒋经国的什么“干儿子”，只是早年在抗战歌咏班时，结识了蒋经国及其情人章亚若等。本文回忆了当年认识蒋经国的情况，谈了许多蒋经国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并介绍了由于这段历史自己被作为“肃反”对象的经过。

青春回眸

——我的兵团生涯 …………… 徐小斌(83)

描写“文革”中知青命运的作品不少。然而作为当代颇有名气的中青年女作家在本文中以自传体的形式讲述了她从16岁开始在北大荒的知青生活，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一批女青年的共同境遇与不同的命运。

在沼泽中跋涉 …………… 艾 煊(105)

作者在50年代是省文联领导人，因对文学青年创办《探求者》刊物表示赞同而被打成“反党分子”，从此开始了在人生沼泽中作艰难的长途跋涉，直到30年以后《探求者》案件化解，大家才能痛快的哭泣流泪。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 陈凯歌(132)

当今中国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出生于导演世家。他在本文中写了他们一家人在“文革”中许多所谓“黑帮”、“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家庭都有过的遭遇。他在文中说：“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名导演对政治运动对人的精神影响体会颇深啊！

离恨依依 李硕儒(184)

作者描述了在政治左右一切的时代，爱情也会受其冲击。但作者仍在那个环境下，维护了自己纯真的爱情，有了理想的妻，不论社会正激烈为这样原则，那样路线斗争，但他们总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然而，当社会稳定期到来后，他的妻儿还是出走到国外了……

双舟难载一个愁 海 笑(240)

作者在抗战时期，就跟党走，参加了革命，但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需官，这就成了他几十年的政治包袱，成为历次运动的审查对象，并累及自己的亲人。在反右时，他躲过了右派关，但在劫难逃，在“文革”期被打成黑干将和阶级异己分子。难怪他谈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我苦多乐

少,灾难深重的往事是不堪回首的,只恐双舟载不动许多痛啊!”

难以承受之轻 甘铁生(283)

在政治运动年代,谁出身于反动军官家庭,或有海外关系,不知要遭多少打击。作者父亲既是旧军官并流亡台湾,他自然无好运相伴。本文描写了他,他哥哥,他母亲就因家庭出身,海外关系而遭受的各样厄运,劫后余生再与父亲团聚,他是悲还是喜呢?

一个最小的胡风 分子的自述 林 希(327)

因为在别人给胡风的信上提到了一个文学青年,于是在胡风作为“反革命案”对待后,这个才十九岁只写过两三篇小文的青年就受到了株连。从此厄运套牢了他二十几个春秋,当再见阳光时,这个小青年已成为小老头了。

坎坷道路 坦荡人生

——记外祖父俞平伯

韦 秦

他是文坛巨子，却从不以名人自居。

他为《红楼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却从不认为自己是红学家。

他十九岁发表新诗《春水》，二十二岁出版诗集《冬夜》，二十三岁写就著名的《红楼梦辨》著作等，却从不以此自诩。

他一生命途多舛，路途坎坷，却从不抱怨，大度豁达，热爱生活。

.....

他就是我的外祖父俞平伯。

1990年1月4日（己 年腊月初八日），他在北京度过了九十寿辰。那天虽是四世同堂，宾客盈门，但他仍是那副老样子，一身旧衣裳，坐着嘎吱嘎吱乱响的破旧小三轮车，去附近的一家餐馆与亲友们聚会。在为他祝寿的同时，我感到他确是老了。九十寿辰的纪念活动，隆重而又圆满地度过，然而，看得出，他的心气儿并不高。早在生日之前他便常说：“过了九十岁就死了。”尽管这只是呓语，

但却似乎真的有一种预感！果然，四个月后，因再度中风，一病不起。病中的他真是可怜，想动，动不得，想说，说不出，一向要强的他，坚持要用勉强能动的右手自己吃饭、吸烟，小便也不肯要人帮忙，看他那股倔犟的劲头，艰难的举动，令人心酸。生死本不可测，他却有先知，这事至今回忆起来，仍令人不解。早在他发病前几个月，他忽然拿出一张随笔涂写的字给我们看，那上面写着：“一瞬不复秋，黄昏齐至京。身后事当在亚运会后，妄涂。”这明明是说，他将再看不到秋天，而亲友们将在“亚运会”结束后的某一个黄昏赶到北京参加他的丧礼。当时我和亲人们看了，并不以为然，哪知在“亚运会”闭幕后的第三天，病情突然恶化，他真的未能看到金色的秋天！他去得坦然，无牵无挂，先前那许多坎坷，许多遗憾，烟云般散去。我相信，他定是带着那颗永不泯灭的童心步入天国，去寻“西湖的六月十八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和“陶然亭的雪”……。

当我两岁时，随母亲自广州来到外祖父身旁，从此四十余载朝夕相处，在他的众多孙辈中，唯有我成长在他身边，我是幸运的。尽管在他重病期间，我已有了他将不久于人世心理准备，但当他悄然撒手离去时，不可遏制的悲痛，使我难以自拔。那原本是淡淡的往事，无可言喻的思念，带着苦涩，沉重地压上心头。

要讲他的故事，实在很多，但每当提笔时，又感到困难重重，也许是因为过于亲近的缘故，在我的眼里，他实在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真的，每当我读他的散文和新诗的时候，总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一种不能把作品和他本人联系在一起的感觉。也许是因为他平日太少讲述往事，诉说心中的不平，甚至在他的日记中也找不到抱怨、议论的话，以至于使我难以把握分寸，难以下笔。在他生前，有多少人希望他能写写回忆录或自传，他一口回绝，我多次的说服工作，也未能奏效。这个“倔老头儿”若说了“不”字，那就谁也奈何他不得。是没得写？还是不想写？答案可从他八十岁后得句“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中找到。这两句，既不是诗，也

不是联，却像是为他因何不写自传作了个注，为他的一生划了个句号。他曾在这两句的后面加注：“十二年为一纪”。若从1954年掀起的那场对他在《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观念”的批判算起，到他八十多岁时，已“三纪”有余了。1954年的他只有五十四岁，正值创作的黄金时代。华年受阻，到“文化大革命”更是不堪回首，他倦了，不想说也懒得说了，只以一种极为特殊罕见的形式，宣泄着他心中的不平：在我的外祖母去世后，每当深夜，常可听到他一个人在房间里自说自话，有时竟是一声接一声的狂吼，这曾给常住在我家的张贤亮兄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贤亮的纪念文章中他写到：“外公平伯公深夜的狂吼，是不是也表现了一点点自己尚余的不平之气与不甘心呢？呜呼！外公，您的不平之气与不甘心只能在地下了。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甘心地离开世界的。能做到您这样的俯仰无愧，也足够我们后人追思和仿效的了。”我相信贤亮的话是对的。

在我与他共同生活的四十年的时间里，从未听他议论过那场对他来说是极不公正的批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之间的谈话，多是等他高兴时把我叫到卧室谈上几句，或是他走到客厅，大家听他议论一番。我们之间的谈话，没有什么一定的主题，但总括起来是谈诗词、写作多，谈《红楼梦》少；谈天下事多，谈家事、往事少。“文化大革命”中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这对他说来，当然是有意回避的，所以他若不提《红楼梦》，我们是没有那个胆量去碰钉子的。由于深知他的心境，许多想向他求教“红学”的来访者，大都被我们家人“挡驾”。别看他平日和和气气的，若惹得他不高兴，脸一板，眼睛直直的，也怪吓人的。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红学家”，只说：“我仅是读过红楼梦而已，且当年提及‘红学’只是一种笑谈，哪想后来竟认真起来！”这种在家中不谈《红楼梦》的状况，直到1986年才略有改变，那年为参加纪念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的活动，他整理了旧作《评〈好了歌〉》。为赴香港

讲学，在我的协助下修改了《索隐派与自传说闲评》。那一年，是我听他讲《红楼梦》最多的一年，他的话虽不多，但却极为中肯，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自己，修正错误。在香烟缭绕的卧房里，我时常呆呆地望着他，为他不再有时间和精力评说“红楼”而感到惋惜。从他的谈话中，得知他曾有过“红楼梦一百问”的写作计划，但因“文化大革命”而夭折，他所有的笔记及资料，全部毁在“红卫兵”手下！“现在手头上什么都没有了，你说我还能做什么！”他说得有些激动，有些愤愤然。我无法揣测在他的心底留下多少遗憾，有时我倒真的希望他能发泄一下，那总要比闷在心里强得多，但他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即使在他留下的日记里也找不到一句牢骚话。这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他深夜的狂吼，那定是一种发泄——一种与世无争的发泄。

1954年，我只有八岁，对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一无所知，后来了解到的情况，大多像读历史那样，从书报中得到的。在一次与外祖母的闲谈中，她偶尔提到当年的情况，说：“那时我和你外公都很慌，也很紧张，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连往日的朋友都很少走动。我很为他担心，但总算还好，过去了。”仿佛是受了外祖父的影响，她回忆这段往事时，也是那样平静，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后来，在我读了他当年写给挚友王伯祥先生的两首七绝之后，才知道他当年的处境是十分孤立的，唯有王伯祥有胆量登门拜访，并相邀同游什刹海，在座落于湖畔的“烤肉季”对饮。这两首七绝并序，是他对1954年批判的唯一文字记述：

容庵吾兄惠顾荒斋，遂偕游
海子看菊，步至银锭桥，兼承
市楼招饮。燔炙犹毡酪遗风，
归后偶占俚句，即录似吟教。

甲午立冬一日，弟平生识于京华。

交游寥落似晨星，过客残晖又凤城。
借得临河楼小坐，悠然尊酒慰平生。

门巷萧萧落叶深，竟然客至快披襟。
凡情何似秋云暖，珍重寒天日暮心。

诗中“交游寥落似晨星”，直道出了当年的处境及身处“荒斋”的他，见到友人来访“快披襟”的喜悦心情。

对那场大批判，他始终是糊里糊涂的，因为当年他并不知有毛泽东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这封信直到“文革”后期在报章公开发表后才读到，他这才弄清了来龙去脉，明白了个中道理。在1986年访港讲学期间，为准备回答记者招待会上有可能提出的问题，我曾在下榻的“亚洲酒店”斗胆提出了问题：“如果有记者问及1954年的问题，该如何回答？”他想都没想便说道：“那是过去的事了，提它又有什么用。我的《红楼梦辩》写于1922年，50年经修改成为‘红楼梦研究’，没有任何政治倾向，是不是‘唯心’，有没有‘唯心’成份，不敢说一定，但就我的学术论点而言，说是‘资产阶级的’则过头。”说到这里，他停住，想了一想，接着说：“这些话还是不必对记者说罢！”看得出老人家仍是心有余悸，这余悸是永远无法消除的，这余悸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研究工作，带给他许许多多无可挽回的遗憾。这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他深夜的狂吼，那定是一种抱怨——一种永不肯对世人讲述的遗憾。

说到“余悸”，使我想起了外祖母。一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在她心中的“余悸”比起我的外祖父是有过之无不及。外祖父尽管很少谈红楼梦，但毕竟还是有“瘾”，“瘾”一上来多多少少要说几句，尽管是在家人之中，外祖母也总是要从旁提醒：“你还是少说几句吧！”由此我想到，外祖父很少谈“红楼”，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受到了她的影响。他一生带给她的“麻烦”太多了，晚景仅求个平

安。外祖母始终未能听到对1954年大批判的正确评价，她带着惦念和不安离开了人间。八年后，那场公案才有了结论，八年后，外祖父在我的陪伴下访港讲说“红楼”，我相信，若外祖母在世，此行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心中有过多的“余悸”。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召开了纪念会。为准备会上的发言，他很是犯愁。一点儿不讲，说不过去，但又没有新作可公诸于众。于是他把1980年5月26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和旧作《评〈好了歌〉》整理出来，以“旧时月色”为总题，由我代读。

这次纪念活动，对1954年不公正的批判，有了结论。胡绳先生在致词中，称他是有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具有开拓性；1954年对他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它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刘再复先生在祝词中说：“俞平伯先生以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双层建树，使自己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为数不多的学者、作家、批评家兼诗人。”刘再复从“新文学创作”“古诗歌与词研究”和“红楼梦研究”三个方面，对他所作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俞平伯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劳动态度会更广泛地影响我们的学术界。”

在我和家人看来，这次活动是重要的，为此，会后我们在家中准备了茶点以示祝贺。但外祖父却是淡淡的，并不显格外兴奋，也不讲什么。他在想什么，没人知道，日记中也不见记载。也许他在发言中的最后几句话，已经概括了一切：“往事如尘，回头一看，真有点人像‘旧时月色’了。”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一切毕竟全都过去了，不该发生的发生了，失去的却永无法挽回，好与不好，兴奋也罢，悲哀也罢，都已成为如尘往事。这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他深夜的狂吼，那或许是一种感叹——一种永不惊动世人的叹息。

纪念会是开了，然而回想起来，又是怪怪的。在筹备期间，我们

就被告知，会议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小礼堂举行，又被告知，因会议室场地有限，仅可容纳二百人，因此请我们尽量压缩邀请名单……很多人因“场地有限”被拒之门外。有关新闻的报导更是“场地有限”，与1954年的声势恰成反比。更可笑的是，在会后我便被告知要出版一本“纪念文集”，这本“纪念文集”，用了近七年的时间才问世，被纪念的人早已离开了人世。如此种种，究竟为哪般，百思不得其解。莫非也是心有余悸？！

与“纪念会”相反，外祖父同年十一月的香港之行，把他的晚年生活推向了高潮，盛况空前，轰动海内外。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远行，最后一次学术活动，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三联书店的邀请，外祖父于1986年11月19日开始了为期七天的访港讲学活动。大力促成此行的是我的好友，外祖父的忘年交，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彦火）先生。我和耀明筹划这一活动的初衷，是想通过此行，打破他在外祖母去世后，过于孤寂、沉闷的生活，他那深夜的狂吼，时时使我们不安，时时敦促我们为他做一点什么。当我在香港与耀明兄和两家主办单位敲定此事时，并没有征求外祖父的意见，但根据我多年与他生活所得的经验，我心中有一定的把握，当然并没有什么依据，只是凭两心相通带给我的一种感觉。果然，当我回到北京把这一计划通告外祖父时，他没有回绝，并很快地进入了“角色”。这一安排，果然打破了沉寂。改变了他的生活。为准备演说内容，他又拿出了他那股子认真的劲头。首先，他检出几篇未发表的旧稿，反复推敲选哪一篇更为合适，往往是刚刚与我商定，不一会儿又推翻重新考虑。我则是时刻待命，随叫随到。方案终于确定了，修改1978年所作《索隐派与自传说闲评》，并附《评〈好了歌〉》。“闲评”一文的细数了“索隐派”、“自传说”不同研究方法的优劣与得失。众所周知，他曾是“自传说”的拥护者，但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此说并不偏袒，且进行了自我反省与批评，他说：“到50年代《辑评》一书

出版了，原只为工作需要，却也附带起了对自传说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我感到很惭愧。”如同他的《评〈好了歌〉》，他不带任何成见地客观议论，把自己置身于“红学”圈外。从这两篇文章中，可看到他在学术观点上的一些变化。从不固执己见，是他一贯的治学态度，他一向认为，学术研究与其它事物一样，是在不断变化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才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发展。他人虽老了，然而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并不陈旧。

在我和他认真的，逐字逐句地准备讲演稿的同时，我的母亲为他出访的“行头”绞尽脑汁。外祖父一生很不讲究穿戴，在家中永远是一身布衣裤，偶尔出门，也只是极普通的卡叽布中山装，脚踏一双布鞋，且所有的衣物都是旧的，有的甚至是补了又补。我的母亲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只有一件半新的中山装勉强穿得，问他要不要添置新的，他摇摇头说：“这就很好！”就这样，他脚着布鞋，头顶布帽，穿着我母亲为他赶制的布裤，乘着借来的手推轮椅，离开了北京，飞往阔别了60余年的香港。

作为陪伴，我感到责任重大，为他能否经得起旅途的劳累，也为他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繁忙的生活节奏。由于耳聋，他听不到飞机起飞的轰鸣，以至升至8000米高空，仍以为在平地，故有“平稳无异常感觉，似不动亦不向前行”之感。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乘飞机，50年前曾从北京飞到天津，乘那“老”飞机，自当是另一番滋味。人到香港，立即被不断来访的记者及亲友包围，到睡下，已近十一时。整整一天，近十七个小时未曾好好休息，但他并不感疲倦。熟睡至翌日晨六时，与在家中状况迥然不同，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至此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北京久居，很少活动，此行更换环境，耳目全新，想对身体有益。”这是他当日的感受。当我把此情告诉耀明兄时，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大胆的计划，达到了预想的目的。

他抵香港，成为重要新闻，香港各报早在他到达之前的数月，

便开始了多种报导：文汇报社论“期为红学再放异彩”，“俞平伯成就将重新肯定”，“卅年再话红楼”，“金声玉振，条理始终”……，就连要配一副眼镜的事也成为报导的热门话题。果真就在眼镜店被一位普通妇女认出，上前搭话说在报上就看到了老人家的照片，说是要配副眼镜好好睇下香港！

对一向喜吃的外祖父来说，到了“吃在香港”的美食城，可谓“如鱼得水”。我和在香港定居的妹妹一家人深知他的嗜好，对他的三餐精心安排，除参加宴会外，还让他吃到不同风味的菜肴。对香港食物的精美，服务的热情周到，他赞赏备至，在访港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菜精美、蟹、鱼、烧二冬均佳，尤以海蜆头为最，鲜嫩无比，久未吃过。菜丰盛，不敢多吃，每样一点，便很饱。……香港夜景之明，留下深刻印象。各种服务热情周到，此种事虽小，亦很重要，可由小见大。

旧地重游，他记忆中的香港已不复存在，60年的巨大变迁，使他感慨万分。23日，耀明兄陪他游太平山，见缆车缓缓爬上山，顿忆起66年前乘缆车上山的情景，往事历历，恍如隔世。当我们共坐在顶楼喝咖啡时，随笔为耀明写下杜甫句：“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道出了他的感受。

现代化的香港，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赞叹香港的社会服务，喜欢“招手即来，不挑肥捡瘦”的“的士”；更为香港有一批成为社会中坚的有为青年感到欣慰……。

这一年的圣诞节，他写了“梦里香江留昨醉”寄香港报刊发表，以此寄托对香港各界友人的思念。在香港的七天，他得到了晚年生活中难得的一醉。

赴港访问期间，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正式公开露面仅两次。

第一次是会见记者。出席 21 日下午记者招待会有 40 余人。根据商定好的方案，在他致简短的开场白之后，由我分“来港前后之经过”、“‘文革’期间的情况”、“对香港的印象”三个方面向记者介绍了他的情况。记者招待会后的新闻报导变得更加活跃，尽管报导方式、透视角度不同，但都表露出对这位“出土文物”（香港报刊语）的尊敬。细阅当时的剪报，便可发现，香港各界人士对他表现出的热情和尊敬，绝不是凑一时的热闹，他们对他坎坷的经历以及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表示同情，对他的学术成就、治学态度和刚正不阿的为人表示由衷的钦佩。

“治学可以平实，可以哗众，俞平伯人如其字，平实而已。”

（《明报》王亭之文）

“我对‘红学’全无所究，对他的倾慕，不因他是研究《红楼梦》的权威，而是他治学、处世的雍容大度。”

（《晶报》薛后文）

“笔者除对他敬重，还对俞老伯多添一分亲切感；会场门外，各人也被俞的魄力，及研究学问的精神和热心而感动。”

（《申报》李颖思文）

从这些议论中，可见一斑。

偏偏是他，一个从不肯抛头露面，从不会阿谀奉承，从不为自己辩解的人，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爱戴，他以一片爱心拥抱人类、拥抱世界，同样他得到了爱的回报。做人难，潇洒做人更难，他做到了！

在香港的第二次公开露面，便是十二日在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的讲座。“该次讲座将本次访问推向高潮，门券一早派罄。”（《文汇报》）。是日，会场座无虚席，并另开一室以闭路电视传送会场实况。他在简短的致词后，略谈《红楼梦》的三种版本，并宣布了他在读